

# 中国是不是低度城镇化

周一星 王玉华

**【提要】** 围绕着中国城镇化的实际水平,本文综述了国内存在着的低度城镇化和非低度城镇化两种观点,并对他们的论证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无论是改革前或改革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均处于低度城镇化状态。

**【作者】** 周一星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王玉华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扩大内需成为中国维持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城镇化问题受到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被纳入了国家的“十五”计划,成为国家一项基本战略,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于是,如何准确估计中国城镇化的实际水平,更为有效地促进城镇化发展,为国家的宏观政策提供正确的理论依据,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本文综述了国内有关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 一、低度城镇化与非低度城镇化

人们普遍认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从城镇化的实际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考察,可能存在三种城镇化的状态:适度城镇化、过度城镇化和低度城镇化(周一星,1995)。适度城镇化表现为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同步协调,互相促进,城镇的数量和规模增长适度,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同步上升。过度城镇化表现为过量的乡村人口盲目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迁移,超过了国家经济所能承受的能力,从而影响经济发展,一系列“城市病”也随之产生。低度城镇化这一概念在1989年被首次提出,指的是城镇人口的实际增长速度低于城镇工业生产率发展所需要的人口增长速度,主要是计划经济国家人为政策的结果(Ran and Berry,1989)。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一概念延伸为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水平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使大量的过剩农村劳动力没有出路,带来整个经济的低效率和一系列的“农村病”,它和过度城镇化一样也是病态的。

最近,国内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讨论中国目前城镇化的实际水平,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本文分析这些观点后发现,可以将他们的观点概括为两类:低度城镇化与非低度城镇化。持前一种观点的人认为,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严格的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政策,现在的城镇化水平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持后一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并没有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是与之基本相适应或呈隐性超城市化状况。下面让我们分别看一看他们的论证。

## 二、低度城镇化观点的论证

### (一) 产出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的比较

持低度城镇化观点的学者分析城镇化水平与产出水平的关系后认为,与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目前仍然处于低度城镇化状态。

付晨(1995)分析了114个国家的经验资料后认为,当人均GNP由300美元增至645美元时(以1980年美元汇率为基准),城镇化水平从20%升至33%,而中国1980~1990年人均GNP从300美元增至625美元,城镇化水平仅从19%提高到26%,说明中国处于低度城镇化状态。

周一星、曹广忠(1999)指出,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口径中国1997年人均GDP为860美元,第一次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当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为29.9%(世界银行公布数为32%)。仅相当于下中等国家1980年的水平,比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2%低12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46%低14个百分点。王一鸣等(2000)也认为,若按购买力平价(PPP)标准计算的GNP比较,中国1997年人均GNP为3570美元,而世界上人均GNP在2040~4840美元之间的国家共有28个,其城镇化平均水平为52.6%。相比之下,中国城镇化水平落后约22个百分点。虽然世界银行高估中国1993~1997年的GDP数据(许宪春,1999),但从这一方面寻找数据,结论是肯定的。

孙立平(1996)认为,建立在人民币对美元现行官方汇率基础上的中国人均GDP,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而购买力平价法则又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在这种状况下衡量的城镇化水平的滞后并不可信。他觉得,以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采取1982年和1983年的汇率(即1美元相当于2.5元人民币)比较适宜。根据他的修正,认为1992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850~1000美元,也可定为约900美元。根据人均900美元进行比较,在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中,除巴布亚新几内亚外,其余国家1989年的城镇化水平:科特迪瓦为40%,多米尼加为59%,摩洛哥为47%,洪都拉斯为43%,危地马拉为39%,刚果为40%,叙利亚为50%,喀麦隆为40%,比中国的26%要高出约13~33个百分点,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落后于其他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

## (二) 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较

这里的所谓工业化率,是指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工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城镇化率是指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关联性,许多学者以工业化率比照城镇化率,来分析中国的城镇化滞后与否。

陆学艺(1995)指出,1978年中国的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分别为49.7%和17.9%,二者相差近32个百分点;1993年则分别为51.8%和28.2%,二者的差距虽然已经缩小到22个百分点,但仍存在城镇化滞后状况。李保江(1999)则指出,中国1997年的人口城镇化率为32%,比世界46%的平均水平低14个百分点,但同期中国的非农化率为81%,工业化率为43%,仍分别高出人口城镇化49个百分点和11个百分点。辜胜阻早在1991年用同样的指标得出过城镇化滞后的结论。

杜辉(1992)通过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工业化率/城镇化率),即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偏差来进行判断,认为1991年中国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达77.58%,比1978年提高2.38个百分点;人口城镇化率1991年为26.37%,比1978年增长了8.45个百分点;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偏差1991年为2.94,比1978年减少1.68,两者的偏差有所降低,说明虽然改革后城镇化速度有所加快,但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依然存在。

程方敏(1997)比较了国内工农业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1949~1979年期间,中国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30:70转变为75:25。在30年里农业产值比重已经迅速下降,而1979年的农业劳动力仍占总就业劳动力的70%,城镇化水平只有17.92%,二者严重失衡。孙永正(1999)则认为,1997年,中国农业就业人员比例首次降到50%以下(49.9%),但年末乡村人口比重占70.1%,即农村人口比重高于农业劳动力比重20个百分点,城镇化率仅为29.9%。而世界中低收入国家组的城镇化率平均为52%,考虑到中国刚步入这一国家组,农村人口一般略高于农业劳动力比重,中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至少在10个百分点以上。

与国外非农业劳动力比重和城镇化偏差情况来对比,郭熙保(1997)指出,中国1952年非农业

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 42%，非农业劳动力比重为 16.5%，城镇人口比重为 12.5%。到 1992 年，三者分别提高到 70.8%、41.5%、27.6%，40 年中分别增加了 28.8、25 和 15 个百分点。而韩国从 1960 到 1991 年，非农产值比重从 63% 增加到 92%，非农劳动力比重从 34% 增加到 80%，相应的，城镇人口比重从 28% 上升到 72%，分别增加 29、46、44 个百分点。中韩相比，中国不仅非农业劳动力比重与城镇人口比重的偏差从 1952 年的相差 4 个百分点扩大到 1992 年的 14 个百分点，而且城镇化增长速度明显较慢。叶裕民(1999)则通过中日对比认为，中国 90 年代中期的工业化水平与日本 60 年代中期基本相当，1997 年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与日本 1965 年相似，但同期中国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比日本低 25.2 个百分点，城镇人口比重滞后更达 38.2 个百分点。

### (三) 模型测算

除了横向、纵向比较外，最近还有一些学者根据模型对中国城镇化水平进行了测度。

辜胜阻(1991)参照世界银行 1981 年提供的亚洲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计量模型： $U=0.52+1.882I$ ，建立了 1949~1988 年中国的城镇化模型： $U=5.551+1.075I$ ，按两个模型的计算结果相比，1988 年中国城镇化率滞后 10 多个百分点。

陈迪平(2000)则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建立的模型，以及关于人均 GNP 在 100~1 000 美元的发展过程中，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人口城乡分布结构的变化将完成其结构转换的 90% 的论断，在人均 GNP 为 1 000 美元时，劳动力配置结构中第一、二、三产业应分别为 25.2%、32.5% 和 42.3%，城镇化水平为 63.4%。他认为中国 1997 年人均 GNP 已达到 740 美元，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配置为 49.4：23.7：26.4，而城市化水平仅为 30%，明显偏低。余立新(1994)认为，依据钱纳里模型、经济计量模型，按中国 1990 年的人均 GNP 或工业化率分析，城镇化水平至少应达到 40%，实际滞后近 15 个百分点。

俞德鹏(1994)将 1990 年 3 000 万人口以上大国的经济水平与城镇化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后，建立了“大国模型”(由于数据的取得或对城镇化的行政干预过多等原因，他将前苏联、波兰、越南、中国、缅甸等排除在样本之外)。根据 1965~1990 年城镇化的大国模型： $1/(Y-7.5)=0.01086+44.74/X(X>0)$  测算，他认为 1990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应达到 37.1%，实际水平呈滞后状态。同时，中国与世界 20 个大国之间的城镇化水平的偏差在不断增大，1978 年为 4 个百分点，至 1991 年达到 11 个百分点，预计 2000 年将增加到 14 个百分点。

王一鸣(2000)等通过计算城镇化偏差系数来分析中国城镇化滞后的状况。他们定义同时期内城镇人口比重的变动额与非农业劳动力比重变动额之比与 1 的差值为城镇化偏差系数。差值为正，说明城镇人口增长比率高于非农业劳动力增长比率；差值为负，说明城镇人口增长比率低于非农业劳动力增长比率。计算结果显示，除 1978~1982 年外，城镇化进程均相对滞后于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进程，偏差值在 -0.4~-0.65 之间，并且，进入 90 年代以来，偏差的绝对值在扩大，说明中国城镇化水平滞后状况较以前更为严重。

尽管这些模型本身并不完善，而且城镇化水平不仅仅取决于人均 GNP，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但这些模型大体上都反映了中国城镇化水平滞后的状况。

## 三、非低度城镇化观点的论证

### (一) 产出水平方面的比较

刘勇(1999)认为，从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来看，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基本相适应的，仅稍显滞后，并没有太多地偏离所谓“世界平均模式”。理由是，《1994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数据表明，1992 年人均 310~470 美元的国家，城镇化水平在 25%~29% 之间，中国的情况落在此范围之内低线附近。世界银行《1998 年世界发展指标》提供了按 1996 年美元价格计算的

结果,即人均1 000~1 500美元时,城镇化率在30%~40%之间。1997年中国人均GDP大约为740美元左右,城镇化水平在30%以下基本符合上述判断。我们认为刘勇在该处的资料引用有误,据查,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标》人均1 000~1 500美元的国家共14个,城镇化率的算术平均值为54%。

刘连银(1997)利用联合国《世界城镇化展望(1990)》的统计,1985和1989年印度的城镇化率分别为25%和27%,印度尼西亚分别为25%、30%,巴基斯坦分别为29%、32%,泰国分别为18%、22%,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它们相似,而中国1985、1989年的城镇化率分别为23.7%、26.2%,中国的城镇化率与这些国家并没有多少差距,基本相符,并没有滞后。

孟立连(1993)则认为,产出指标的比较本身就存在着缺憾,并不可比。因此,用产出水平比照城镇化水平,并不能反映城镇化水平滞后与否。

## (二) 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不可比

与使用工业化率比照城镇化率来说明中国处于低度城镇化的观点相反,刘连银(1997)认为,由于中国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中国工业化水平与其劳动力容纳能力不相称,进而造成了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不一致,因此,城镇化率超过工业化率的观点没有根据。刘连银还认为,就业人口的变动与工业化的关系是复杂的,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比例关系,无论是工农业生产部门还是非物质生产部门,工业化发展并不必然地带来就业人口的增长,因为城镇化水平归根到底取决于城镇产业的就业能力,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样也没有固定的比例关系。所以,用工业化率比照城镇化率是不可行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之说也同样是无稽之谈。

## (三) 流动人口计入后的比较

陈阿江(1997)指出,中国城镇人口统计指标的不确切性,使得无论按城乡标准还是按户籍标准划分,都没有将正在或已经城镇化了的农村人口考虑进去,均存在着偏差;若按从业标准统计,则计入了上述人口,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50%左右,略高于世界城市化率44%的平均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37%的水平,但他也认为此标准同样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李珍刚(1998)认为,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测算是以市镇的常住人口即户籍人口为标准的,而不包括大量在城市有固定收入并长期定居的“流动人口”,加上这部分人口,1994年城镇化水平至少能达到33%。同时,除农村流动人口外,中国小城镇中还包含了较多的农村就业人口,而中国“一刀切”的设置标准使部分即将达到城镇人口“门槛”的乡集镇未被统计在内,也造成了对中国实际城镇化水平的过低估计。根据测算,中国以上两种形态人口不会低于6 000万~8 000万,因此,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还可提高7个百分点。

邓宇鹏(1999)则认为,根据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并不能得出中国城镇化水平滞后的结论。因为城市人口是按户口统计的,而工业生产的GDP有相当一部分是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创造的,将这部分产值均算在城市人口身上是不科学的,只有把乡镇企业职工、外出打工者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均算入城市人口才算合理。并认为,1997年中国农村总人口为86 637万人,农村劳动力49 393万人,平均每个劳动力分摊人口为1.75人。到乡镇企业就业劳动力为15 558.8万人,外出就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为21 486万人,加上其抚养的人口,总量为37 600.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30.4%,这部分人口得不到公开承认,只好称为隐性城镇人口。中国实际的城镇化率应该是隐性城镇化率加政府公开承认的城镇化率,即60.34%。

# 四、不同认识的焦点所在

## (一) 产出水平比较的争论

无论是持低度城镇化还是持非低度城镇化观点的人,均采用产出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相比较的

办法,说明在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这一点上有共识。但是,使用同样来源的资料(如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得出的结论却全然不同。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采用数据的年份不同或选用的指标不同而造成不可比,而主要原因是城镇化水平与人均 GNP 或 GDP 之间的规律性只是一种拟合的统计规律,而不是一种定数规律,以某种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整体平均水平作为参照样本,比采取个体样本的可比性要强。

## (二) 工业化水平与城镇化水平比较的矛盾

在许多用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相比较的研究中,都假设它们之间是一种同步发展的关系,因此用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之间的偏差,来反映中国城镇化水平滞后的程度。这里存在着一种误解,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不能等同于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城镇化的前中期,城镇化水平确实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是到中后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却伴随着工业劳动力比重和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后果的说法是并不严密的。因此,用工业化率比照城镇化率来判断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也不严密。

## (三) 中间形态人口的隐性城镇化之争

持非低度城镇化观点的学者,其论据之一是中国城镇人口统计口径不严密,以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人口已严重失实,同时,大量在城市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以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人口并没有被统计在内,以此为基础计算,则中国处于隐性超城镇化状态(陈阿江,1997;邓宇鹏,1999)。看来,对中国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需要做一些澄清。

1. 中国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确实多变而不规范,问题很多。但是,现在大家使用的城镇人口的历年比重是国家根据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四普”)的城镇人口统计,按相同口径对 1990 年前的数据经过了修正,又按相同口径对 1990 年后进行抽样调查得出的数据。“四普”的统计口径是在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口径偏小,而市镇总人口的口径又太大,均不能反映中国实际的城镇人口的背景下做出的调整。虽然这一口径对设区市是偏大统计,对不设区市和建制镇是偏小统计,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不可比,仍需要继续改进。但偏大统计与偏小统计的抵消,在当时大体上仍可反映全国的城镇化水平(周一星、孙樱,1992)。在此基础上,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对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又一次进行了改进,其基本精神是:(1)用人口密度把设区市的区分成两类,只把 1 500 人/平方公里以上的区(一般是城区和近郊区)的人口全部算为城镇人口,而对 1 500 人/平方公里以下的区(一般是远郊区),只计算真正的城镇部分,乡村部分不再计入城镇,从而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四普”对设区市城镇人口的偏大统计。(2)对不设区市和建制镇,除了按照城市社区管理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人口以外,还包括了与市镇驻地建设用地相连的乡镇地域和村委会地域,可以认为这一地域的人口大都以非农业经济活动为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四普”对不设区市和建制镇人口的偏小统计。因此,从原则上讲,这一标准比“四普”完善。按照“五普”公布的结果,2000 年 11 月 1 日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为 36.09%,尽管比“四普”口径大了大约 4.7 个百分点,但调整后的中国城镇化水平仍然是滞后的。

2. “四普”的城镇人口口径并不是纯粹按户口统计,它已经包括了离开户口所在地 1 年以上的在城镇居住的外来人口,也减去了离开城镇户口所在地 1 年以上的户籍人口。就是说城市外来人口的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已经作为城镇人口统计在内。1998 年,中国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仅为 22%,而同期城镇人口比重为 30.4%,这也说明了城镇人口统计中已包括了 1 亿多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业人口。“五普”统计的城镇人口,进一步放大了外来人口的统计口径,把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的城镇外来人口计算为城镇人口。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城镇人口统计中并没有包含外来人口,从而城镇化水平统计值偏低的不成立。

3. 进入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及其家庭人口是不是应该计入城镇人口,也值得商榷。首先,职业

上的非农化并不等同于城镇化,从事非农业活动的人口与城镇人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镇人口中可以包括部分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口,而分散在乡村从事非农业活动的人口却不能看做是城镇人口。中国存在着大量分散在村农户的乡镇企业职工和他们的抚养人口,这正是中国城镇化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也正是中国积极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对象,他们在实现产业转移的同时,要克服制度障碍,促进他们也实现空间的转移,尽量组织到城镇社区中来,而不是简单地把所谓的隐性城镇化人口计入城镇人口中。再说,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中兼业程度较高,相当一部分人员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回村务农,这部分人口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职业上向非农业的转化。

4. 流动人口指的是不改变常住户籍而离开常住户籍所在地的人口,也分为多种类型,包括过往人口和暂住人口,而暂住人口又包括从农村到市镇、从农村到农村、从市镇到市镇、从市镇到农村四大类,真正能够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只是从农村到市镇的这一部分暂住人口。人们往往忽视把流动人口都作为城镇人口必然高估中国的城镇化水平。郭志刚、邓国胜(1999)测算出1990年全国从农村到城市的暂住人口为1 869万~2 472万,即使在“四普”的城镇化水平26.23%的基础上再加上这部分人口,也只有大约27.89%~28.43%。仍然大大落后于世界平均的城镇化水平,甚至落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 五、结 语

通过对上面两种观点的分析,我们认为,尽管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到城镇化水平的高低,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作为一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两个侧面,它们之间应该协调发展是毫无疑问的,过分超前或过分滞后的城镇化政策均不足取。从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能成立的,用产业结构的工业化率来比照城镇化率在工业化的前期阶段虽可说明一些问题,却不能应用于长远,不如用非农化率较为严密,它们之间也不会是线形关系。中国目前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并不是完全以户籍人口为根据的,已经包括了部分的农业人口和离开农村一定时间在城镇居住的外来人口。

中国究竟是不是低度城镇化?我们的回答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949~1957年是城镇化短暂的健康发展阶段,1958~1978年是长达20年的大起大落阶段,前四年为“大跃进”期间的过度城市化,后十几年为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两次反向城市化。总体上城镇化呈低度状态。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城镇化进入了新的持续稳定的快速发展阶段。但是,一方面由于过去长期低度城镇化留下的影响不能很快弥补,另一方面由于这一阶段又推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政策,丧失了一部分城镇化发展的机会,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相比,这一阶段中国的城镇化仍然带有低度城镇化的特点。因此从总体上说,中国目前整体上处于低度城镇化是可以肯定的。当然这样讲并不否定中国在局部地域或部分城市的城镇化是适度的或过度的,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 参考文献:

1. 陈阿江:《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检讨与战略选择》,《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3期。
2. 陈迪平:《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与主要对策》,《天津商学院学报》,2000年20卷,第1期。
3. 程方敏:《城镇化滞后的代价与道路选择》,《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7年第2期。
4. 邓宇鹏:《隐性超城镇化及其成因》,《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9月29日。
5. 杜辉:《略论我国工业化升级转换中的战略选择》,《经济研究》,1992年第4期。
6. 付晨:《农村城镇化滞后的症结与对策》,《经济体制改革》,1995年第3期。
7. 辜胜阻:《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8. 郭熙保:《城镇化:迈向21世纪的战略选择》,《经济动态》,1996年第3期。

9. 郭志刚、邓国胜:《论我国城镇化的实际水平》,《人口与经济》,1999年第5期。
10. 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中国统计信息网,2000年3月23日。
1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12. 李保江:《城镇化诱致性农业发展的制度分析》,《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13. 李珍刚:《建国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回顾与前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
14. 刘连银:《中国城镇化的道路选择》,《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15. 刘勇:《我国城镇化回顾与展望》,《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4月14日。
16. 陆学艺:《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新华文摘》,1995年第5期。
17. 孟立连:《农民,发展与城镇化》,《人口研究》,1993年第4期。
18. 世界银行:《1998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19. 孙立平:《中国的城镇化是滞后还是超前》,《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5期。
20. 孙永正:《城镇化滞后的八大弊端》,《城市问题》,1999年第6期。
21. 王一鸣等:《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若干问题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22. 许宪春:《世界银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方法已经过时》,《中国国情国力》,1999年第5期。
23. 叶裕民:《中国城镇化滞后的经济根源及对策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24. 余立新:《排除认识障碍,加快城镇化进程》,《人口研究》,1994年第1期。
25. 俞德鹏:《户籍制度与城镇化》,《城市问题》,1994年第1期。
26. 俞德鹏:《中外城镇化进程的定量比较》,《人口研究》,1994年第2期。
27. 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
28. 周一星、曹广忠:《改革开放近20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城市规划》,1999年第12期。
29. 周一星、孙樱:《对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市镇人口比重的分析》,《人口与经济》,1992年第1期。
30. Ran, M. and Berry, B. J. L. (1989), Underurbanization Policies Assessed: China, 1949—1986, *Urban Geography*, 10 (2):111—120.

(本文责任编辑: 朱 犁)

## 《中国人口科学》编辑部 稿 约

一、本刊着重刊登学术论文、调查报告、研究综述、会议综述、书评、学术动态等稿件,但不刊登在国内外已公开发表的文章。欢迎各界人士踊跃投稿。

二、来稿字数在10 000字以内为宜。稿件最好能打印清楚,正文字体不小于4号字,并留有行距,以便修改。文中的插图应清晰,并请用电脑制作。

三、投寄本刊的文章,如引用他人论著或观点,请注明出处。脚注或文后列出的参考文献均要注明作者、篇名或书名、出版单位(或期刊)、出版年份和页码;中文书名用《》号,外文书名用斜体。

四、来稿请附200~300字的内容提要及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工作单位、现任职务和职称)。请尽可能将文章题目译成英文。

五、投寄本刊的稿件,请勿一稿数投。如果出现重复刊登,本刊将严肃对待,要求作者承担责任。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周期略长。凡投稿4个月后未收到刊用通知者,请自行处理。